

## 崔與之與晚宋政局

王 德 毅

Teh-yi Wang

### 一、前 言

往年研究宋史的學者，多重北宋而輕南宋，尤其南宋後期的歷史，治之者甚少。一方面由於理宗以下之三朝所留下的史料遠較前四朝為少，即使幸存於今日的，也是相當零散。二方面，寧、理、度宗三朝一直是權臣專政，政治非常黑暗，已經喪失了所賴以立國的仁恕精神和安內攘外的奮鬥目標，某些士大夫也缺乏勤正之操，讀史至此，令人傷情。

理宗之得即位，乃是史彌遠為一己之私而矯詔迎立的，實屬欺君之大罪，但並未受到應得的懲罰。相反地，理宗卻非常感激他的「定策」及「擁戴」，仍任其為宰相，繼續獨攬大權。寧宗原先所立的皇子濟陽郡王竑進封為濟王，出居湖州，而天下之人亦有不心服者。湖州百姓潘壬、潘丙兄弟暗通李全，謀立濟王，結果失敗了，本來此事濟王完全不知內情，但史彌遠則是十分忌恨，乃遣其門客秦（余）天錫前往脅逼濟王自縊而死，還令湖州知州申報濟王暴得病，來不及選醫診治就逝世了。過了不久，濟王被貶，降封為巴陵郡公，頗令士大夫不平<sup>①</sup>。同時，李全被牽連在這件疑案中，難以自白，遂率領其部眾叛亂而歸降蒙古，這對南宋造成一大災難。寶祐元年（一二二五）九月，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極言濟王之冤，忠直無所避忌，遂得罪了史彌遠，暗中促使御史李知孝彈劾夢昱，扣上「黨附叛逆」的罪名，被削

① 參見脫脫《宋史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二四六〈竑王竑傳〉，不著編人《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》（文海出版社影印元刻本，以下簡稱《宋史全文》）卷十一。

職、竄逐到象郡，次年，夢昱感染疫病就逝世了<sup>②</sup>。當時理宗下詔求直言，夢昱應詔上書，竟因直言而得罪，這完全不合乎宋朝不殺言事官的優良傳統，可見權臣當道，政治也就越來越黑暗了。

史彌遠是四明人，孝宗朝宰相史浩之第三子，自嘉定元年（一二〇八）十月拜右丞相，至紹定六年（一二三三）十月致仕，在相位整整二十五年，其獨相也達二十四年，在宋代三百二十年的歷史中是僅有的。彌遠貪權戀位，喜用親信死黨，即使選人改官也先及於出自其門下者<sup>③</sup>。至於四明鄉親，被挽引而任京朝官者亦較他府州為多。在嘉定初年，有一次，彌遠在相府歡宴賓客，招來雜劇助興，一位優人扮作士人，唸詩說：「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。」另一優人也作士人，立刻指正說：「非也。『滿朝朱紫貴，盡是四明人。』」這自然刺到史彌遠的痛癢處，他十分不開心，以後之二十年，凡相府有宴會，再也不招雜劇以娛嘉賓了<sup>④</sup>。優孟之言如詩中之風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，而彌遠則沒有這種雅量，他害怕死後被朝臣批判，揭發他欺君之罪，所以早已培植並安排好繼任為右相之人選，這位繼任者就是鄭清之，他是彌遠的同鄉，二人曾密切合作暗地進行廢立之陰謀，清之由擔任理宗潛邸之講官，在理宗即位後步步高升，未曾擔任過州縣之長貳，到紹定三年（一二三〇）十二月便榮升到參知政事，六年十月史彌遠卒，清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，繼續執行彌遠控制言論的政策，打壓為濟王訴冤的呼聲。至嘉熙三年（一二三九年）正月，理宗又超擢彌遠姪嵩之任右丞相兼樞密使，其後嵩之亦獨相四年，沒有朝臣膽敢攻訐史彌遠欺君弄權之大罪。史載：

（彌遠）相寧宗十有七年，迨寧宗崩，廢濟王，非寧宗意。立理宗，又獨相九年，擅權用事，專任儉壬，理宗德其立己之功，不思社稷大計，雖臺諫言其奸惡，弗恤也。彌遠死，寵渥猶優其子孫，厥後為製碑銘，以「公忠翊運、定策元勳」題其首。濟王不得其死，識者群起而論之，而彌遠反用李知孝、梁成大等以為鷹犬，於一時之君子貶竄

② 參見陸心源《宋史翼》（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）卷十六〈胡夢昱傳〉。又《象臺本末》（叢書集成新編本）附傳。

③ 參見周密《齊東野語》（宋元人說部叢書本）卷十三〈優語〉條。

④ 見張端義《貴耳集》（津逮秘書本）卷下。

斥逐，不遺餘力云<sup>⑤</sup>。

理宗完全以私心自用，只知感謝史彌遠擁立他，完全不為國家著想，是非之心已經泯滅了。實則史彌遠也利用理宗以求自保，因為濟王最看不慣彌遠之拔扈，曾私下自矢：「他日我若得志，必置史彌遠於新恩。」意謂罷免後再竄逐於新州或恩州，永不復用。彌遠心生恐懼，乃與鄭清之、余天錫陰謀廢立，最後陰謀成功，彌遠繼續任相，他是為鞏固自己權位，並不是為了理宗，實顯而易見。方回曾說：「彌遠柄國二十七年，窮凶惡極，而此之廢立，且有大逆之罪。」<sup>⑥</sup>這都是國法所不容的。自史彌遠至鄭清之，再自鄭清之而至史嵩之，專權弄勢達四十年，宋室已經病入膏肓，難以救治了。

南宋駐蹕於杭州，兩浙因得地利之便，人才輩出，在政治上常居於優勢。相對地，嶺南距行都較遠，入太學為生員及來應禮部試者為數不多，而能夠中進士且又仕至參政、宰相者尤為少見，崔與之可算是僅有的一位，他的言行事功與其在當時是非不分的政局中如何自處，尚沒有專文討論的，本文的提出，或能稍補一二。

## 二、崔與之的仕歷與功業

崔與之（一一五八——一二三九）字正子，號菊坡，廣州增城人。父親名世明，曾數次報名參加鄉試，都沒有考中，乃慨然嘆道：「不為良相，則為良醫。」遂發憤研究醫學，有了相當地成就。在懸壺濟世以後，遇到貧苦的民衆則不收費，是一位宋人所稱許的儒醫。與之生而岐嶷，卓爾不群，早年喪父，雖家庭貧困不堪，卻能力學自奮。光宗紹熙元年（一一九〇）補太學生，往年廣東士子多怕路遠不願來臨安，與之獨毅然前往。在太學苦讀兩年餘，遂於四年考中進士乙科，為廣南士子由太學取科第者第一人。出任潯州司法參軍，調任淮南西路檢法官，遷知建昌府新城縣，都有傑出的表現。李肖龍輯《崔清獻公言行錄》載其治蹟云：

<sup>⑤</sup> 見《宋史》卷四一四〈史彌遠傳〉。

<sup>⑥</sup> 見方回《桐江集》（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，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）卷四〈鄭清之所進聖語考一〉。

少僮僕有大志，應接事物，動有機警。初任潯州法掾，部使者巡按壓境，驛治久圯，郡委督辦甚峻，瓦無所取，公命吏以茨易廡瓦覆之，倉卒完集。在淮西幕時，王樞密當國，有子豪奪僧寺田，官吏無敢決其訟，公直筆擬斷，不為權勢屈，王聞而壯之，薦於朝。……治新城，以撫字寓之催科，酌道里為信限，悉蠲浮費，民輸直造庭下，東廡交錢，西廡給鈔，未納無泛比，已納無泛追，不事一筭，而賦益辦。前是，編民以役破家相踵，公既去所以蠹役者，民爭應恐後。會歲祲，舉行荒政，供億軍需，無窘蹙峻迫狀，邑境帖然。當路取其規畫，下諸州縣做行之<sup>⑦</sup>。

可見事在人為，只要為官者一念在救國救民，開誠佈公，沒有不可推行的政令。李昉英撰與之行狀云：

開禧用兵，軍需苛急，公悉以縣帑收市，一毫不取於民。和糴令下，公依時直躬自交受，令民自概，不擾而辦，為諸邑最。趙潛使希惲令諸邑視以為法<sup>⑧</sup>

與之僅為一邑之長，就能有此擔當，可見其風節。當時不少地方長官及朝臣都推薦他，希望他留在行都供職，他則再三請辭，乃出任邕州通判。以後歷知賓陽，升任廣西提點刑獄。廣西轄有二十五州，很多地方是荒寂之地，與之到任後，巡行遍及各州，就連遠在海外的瓊州等四郡也親自視察，不愧為一位勤政愛民的官長。據《南海志》載：

朱崖隔在海外，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。公至，父老駭異，諸州縣供帳之類，一切不受。兵吏不給券，攜鐸錢自隨，計日給之。停車決遣，

⑦ 見李肖龍《崔清獻公言行錄》（叢書集成本）卷一。（以下簡稱《言行錄》），又《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）卷一。

⑧ 見李昉英《文溪集》（四集全書本）卷十一〈崔清獻公行狀〉。

無頃刻暇，獎廉勸貪，多所刺舉。風采震動<sup>⑨</sup>。

其清廉正直實在令人欽敬。海外四州軍的地方官吏總認為天高皇帝遠，常做不法之事，與之的蒞臨，並大加整飭，使官吏知有國法，不敢再貪瀆害民，瓊州等地人民為與之立祠堂，年年祀祭。像這樣一位勇於任事的地方官，當時太少了。

寧宗嘉定七年（一二一四），金朝因屢受蒙古的侵略，居庸關不守，中都危殆，金宣宗乃南遷到汴京。這時中原的人民覺察到戰爭可能隨時會發生，遂開始不安起來。有的受不了橫徵暴斂，憤而相率集結保險阻以為之抗。在山東地區就興起一支以楊安兒為首的忠義軍，與金為敵，並有投歸宋朝效忠的意願。及至楊安兒被元兵擊敗，其部眾歸於李全，全據有京東，聲勢浩大。這一新的形勢，對南宋也是一大挑戰，崔與之就在此時奉命出任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。當宋金在嘉定元年（一二〇八）第三次議定和約後，宋在淮南的防務漸漸鬆弛了，士卒不練，城壕不修，如何能抗禦外侮呢？且揚州為江北重鎮，尤應加強防衛設施，以安人心，與之乃於到任後，考察城四郊地形高下，規劃重修城壕，自八年八月興工，至九年九月完成，城壕河面闊十六丈，底部減半，深三丈餘，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，引水注入壕中，使揚州固若金湯。前後凡動用工一百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人次，費錢四十四萬緡，米二萬一千八百餘石，居民雖勞而未擾。洪咨夔稱讚說：

公以正大學問，發為政事，所至聲跡章灼。擊楫東來，恩信孚浹，軍民歸命，恃為長城，識者以經濟事業望之，期役特細耳<sup>⑩</sup>！

與之不但重修城壕，還留心駐守揚州士卒的訓練，分強勇、鎮淮兩軍，每月以三、八日習射，時加教閱，弩手以年富力強而善射者為上等，騎兵以人騎輕捷、武藝精熟者為優等，每月終測試，比較高下，高者獎之，下者勸之，由是淮東軍聲大振<sup>⑪</sup>。嘉定十年（一二一七），金宣宗因為宋朝斷絕歲

⑨ 見明成祖敕修《永樂大典》（大化書局影印本）卷二七四一引錄之《廣州南海志》。

⑩ 見洪咨夔《平齋集》（四部叢刊續編本）卷九〈揚州重修城壕記〉。

⑪ 參見《言行錄》卷一。

幣，十分震怒，及發兵侵犯淮西、湖北，並分兵圍棗陽及光化軍，寧宗命江淮制置使李玨、京湖制置使趙方合力抵禦。此後宋金間年年有戰爭，兩軍互有勝負，而淮東路因邊備較為嚴整，並沒有受到嚴重的侵擾。據《崔清獻公言行錄》卷二載與之迅速警備以保邊疆安全的行事云：

制司密遣劉璋（《宋史》作劉璋）等渡淮攻泗州，全軍敗覆。公慮虜兵乘勝衝突，亟遣強勇馬軍百騎星馳盱眙沿淮一帶巡哨，官給鎗仗及紅綠白布馬衫各百領，併諸色旗幟，令其隨處換易，晝夜往來，莫測出沒，或多或少，或分或散。遇平野則馳騁打圍，移文州縣卻稱分頭遣去五百騎巡邊。又慮盱眙山城孤立，積穀九萬餘石，及鎮江、揚州節次搬去攻守之具甚多，亟選精銳軍三千人，厚加激犒，星夜馳去捍禦。

泗州之敗在嘉定十一年，而丞相史彌遠深怕步韓侂胄的後塵，卻與金議和，與之聞之即上疏說：「彼方得勢，而我與之和，必遭屈辱，今山砦相望，邊民米麥已盡輸藏，野無可掠。……況東海、漣水已為我有，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，一旦議和，則漣、海二邑若為區處？」他深深不以為然。稍後，金兵深入無功，而和議之議也就不再有人提起了<sup>⑫</sup>

與之知揚州前後五年，至嘉定十一年十一月召除祕書少監，軍民遮道垂涕請留，然以朝命督促，乃回臨安就任新職。次年正月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，同年十二月除祕書監，仍兼史職。十三年三月，除權工部侍郎、兼國史院同修國史及實錄院同修撰<sup>⑬</sup>。同年四月，除煥章閣待制，出任成都路安撫使，兼知成都府，十四年十一月，四川宣撫使安丙卒，詔與之兼權四川宣撫使。十二月，除四川安撫制置使。至十六年，一再上奏請致仕，又辭免召赴行在。十七年除禮部尚書，連上四次奏狀請辭，皆不准，並令不得再有陳請。計與之在四川五年，建樹最多。據《永樂大典》載：

⑫ 參見《宋史》卷四〇六〈崔與之傳〉。

⑬ 見不著編人《南宋館閣續錄》（武林掌故叢編本）卷七及九。



會興元倡亂，害總計，逐制臣，除公工部侍郎，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，本路安撫使。公言實邊斯可安邊，益州爲四路心腹，惟恃錢穀厚於他郡。軍興帑庾告匱，宜厚儲積，以壯邊陲。拜疏即行。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虜不克，虜乘勝數盜邊，蜀大擾。丙薨，公便宜度創以鎮關表，除公制置使，盡護四蜀之師。西北二國合縱攻鳳翔，叩鳳州，借糧於我，公條畫事宜，密授諸將，隨宜酬答。膳榜諭陝西五路遺黎，俾築鳩自固，倚我軍爲聲援。建言成都灘瀨險遠，艱於漕運，立爲運米賞格，奏行之。自是兵皆足食，蜀賴以全。

嘉定中，自揚州移知成都府，充四川制置使，清介立身，人謂有文武成風，識大體。自趙汝愚後，才再見耳！寬減征賦，篤志爲民。前此制帥於成都土貢之外，盡取以奉宰相史彌遠，與之曰：民力重困矣，訖不與，彌遠末如之何。羅致西蜀才名之士，其後多爲名宰輔，僉謂與之知人。<sup>⑭</sup>

與之任職西蜀五年，深得民心，成都士大夫相與謀祠祀張詠、趙抃和與之，號曰「三賢祠」，魏了翁謂：「崔公之潔己裕民，憂邊思職，亦近世所罕儷也。其大城西和，虜連歲盜邊莫能入，人尤德之。」<sup>⑮</sup>與之深受蜀人之愛戴，亦可以想見了。

崔與之既連上四次奏狀懇辭禮部尚書之召命，乃由四川回到嶺南，歸老林泉，行前將羨餘的三十萬緡全部歸之總領司，以助備邊之用。當時到四川任地方最高長官的，沒有不被美玉蜀錦所迷的，與之到任後，也有一些地方官依往例前來送禮，他都一一婉拒，離開四川時，地方官又加倍的饋贈，名曰「大送」，與之也加以回絕。真德秀曾說：「崔與之南歸，不持蜀中一物，惟滿載皆書帙而已！」可以見其清廉。理宗寶慶元年（一二二五），詔除與之顯謨閣直學士，任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，兩次上奏辭免，又除寶謨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觀。紹定元年（一二二八），除煥章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隆興府，也一再辭，改除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。六年，有詔赴行在，

<sup>⑭</sup> 同註9，又同卷引錄〈成都大一統志〉。

<sup>⑮</sup> 見魏了翁《鶴山大全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四十九〈簡州三賢閣記〉。

辭不赴。是年十月史彌遠卒，理宗始親政，次年改元端平，號稱更化。起用了十餘位名賢，以粉飾太平。二年二月，廣東發生兵變，與之在地方官紳的懇求下，出而撫綏亂軍，朝廷聞變，即任命其為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。與之奏請暫此守印，以待朝廷擇帥而代之<sup>⑯</sup>。與之〈行狀〉有言：

端平乙未二月，摧鋒叛兵自惠陽擁眾扣州城，郡守曾治鳳宵遁。官吏群造里第，請公登城。公肩輿至，開諭禍福。又遣門人李鼎英、楊汪中縋城親諭之，其徒俯伏聽令，咸欲釋甲以歸。而倡謀者以嘗害博羅令，懼不免，相率遁去，入據古端州以自固。俄有旨：依舊端明殿學士、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，公即家治事，區處條畫，揣摩調度，洞中事機。

與之很迅速地召集四方官兵，命提點刑獄彭鉉率領之，將亂事討平，其降者被分編於諸軍中，並誅戮其首先倡亂的份子。事既定，理宗注想彌切，同年六月，召除參知政事，時與之年已七十有八，連上七次奏章辭免，情辭懇切，始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。三年九月，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，詔有「疇咨一相，已遣蒲輪」之句，與之仍堅辭不拜。至嘉熙三年（一二三九）六月又詔：「崔與之力辭相位，必欲掛冠，特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，恩數視宰臣例。」<sup>⑰</sup>十一月丁丑（十二日）病逝，享年八十有二，遺表云：

事有萬變，而隱乎微，人惟一心，而攻者眾。出而大小忠良之臣，箴規之日少，入而左右佞倖之徒，承順之時多。倘戒謹之志稍衰，則清明之躬易怠。蓋天下以身而為本，惟聖人以禮而自防。毋不敬則內敬常存，思無邪則外邪難入，大書特書，用以自警，安行勉行，久而有功。……登延碩彥，以輔成王德，惠養黎元，以培固邦基。……<sup>⑱</sup>

⑯ 見崔與之《崔清獻公集》（叢書集成本）卷三，《崔清獻公全錄》卷六〈奏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〉。

⑰ 見《宋史全文》卷三十二及三十三。

⑱ 見《言行錄》卷三。



國家大臣臨終所上的遺表，是臣下對君主所進盡的最後忠言箴諫，都是爲人君者當深思勉行的。與之的一生就這樣走完了。朝廷賜諡清獻，贈太師。

### 三、晚宋政局

南宋自寧宗嘉定元年史彌遠專政以後，漸成寡頭政治，國事日已非，國難日已深，有識之士都深深地體認到任何人都難以有所作爲。然身爲人臣者，受君上之命，食國家之祿，或出任方面之寄，或專命親民之職，或司言責，或理財賦，或典禮樂，或掌軍政，在位一日自當盡一日之心，食朝廷祿者忠朝廷之事。崔與之生當此時，既舉進士，出任公職，他所堅持的理念就是忠於所事，鞠躬盡力，所以在淮東、在西蜀，都有傑出的作爲。與之爲郎官，曾蒙劉榘、李玨薦舉，嘉定中，與之出任淮東安撫使凡五年，劉、李二人先後任江淮制置使，於私誼則禮數甚週，於國事則有毅然所不能苟同者。據劉克莊〈跋崔菊坡與劉制置書〉云：

嘉定懲創丙寅、丁卯（開禧二、三年）輕舉，中外以再和爲幸，而清獻告文肅（劉榘）謂：聘使往來，人情懈弛，必至之憂，在於旦夕，宜急修守備以待。不旋踵，其言皆驗。虜先犯浮光，清獻又勸李公（玨）持重，俄而我出泗上師失利，虜大入。廟謀以咎李公，議擢清獻代之，俾續和議，先以貽書諭上意。清獻力言垂亡不可和，李公不可去。後李公開而嘆曰：若他人必擠而奪之矣！……嗟夫！功名之際，人各著鞭，……而清獻處心無競若此，蓋世之未知也。<sup>19</sup>

史彌遠既謀殺了主戰派韓侂胄而奪得政權，諱言戰爭，以對金議和爲得計，希望繼續苟安。然而金兵又來入侵了，應當如何面對呢？彌遠仍迷信議和，而身任抗敵禦侮的封疆大吏則不願輕言和議，事實證明崔與之不可和的看法和修守備的做法，最爲正確。而彌遠只求苟安，一意專權，對於與之建議的創山寨、結義社，募民習騎射，均自以爲生事，而不予採納。

<sup>19</sup> 見劉克莊《後村大全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一〇八。

與之愛獎人才，到益州任安撫使、制置使後，發掘了不少新人才，或辟用，或上疏推薦，《元一統志》載：「全蜀人才多出其門，如游似，一見期以宰相。又曰某人爲侍從，某人爲卿監，某人爲帥蜀，厥後果如鑒裁。」<sup>①</sup>誠能薦用賢才，亦爲美德。如洪咨夔在與之任淮東安撫時被徵辟，擔任幕職，及其後與之安撫成都，又奏請授咨夔通判成都府，始終相隨，這份相知相與之情誼，自非他人所可企盼的。如牟巖所說：

嘉定中，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，其後遂制置西事。賓客從者忠文洪公，實顯賡翰，崔公清規重德，洪公雄文直道，參會一時，蜀人紀之，以爲殆過石湖（范成大）、放翁（陸游）也。崔公出蜀，歸臥五年，杜門謝病，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，擯天目山下。端平改紀，崔公遂相，白麻一出，天下傾想風采，公力辭不拜，御筆手詔旁午於道，朝臣中使守門趣發，公汔不起，以至謝事。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，論駁不少貶，願以病不太用。賓主相爲終始如此！<sup>②</sup>

師友之義，有始有終，洪咨夔與崔與之的信中就說：「寧以窮故負知己，不以通負知己也。況今天下達尊誰出先生之右，門人弟子之最親孰若牛馬走？造物深意安敢不使同退又同進耶？」正是實情。又說：「搢紳間謂：凡任制閫者莫有終譽，獨吾菊坡，不待躡足之疑，便引掉頭之興，綽然餘裕，久而裕安。」<sup>③</sup>亦可想見當時政風敗壞，朝綱不立，真正能夠廉潔自持、進退有據的制閫並不多見。與之清忠端亮，在任四川制置使時，信賞必罰，開誠佈公，他訪得吳昌裔在眉州州學訓教士子，移風易俗，薦授華陽縣知縣。他看到高稼持論不阿，憂國甚切，就辟爲制置司幹辦公事。又聞知李心傳潛心著述，遂推薦其專精史學，著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有補於國史，乃自制置

① 見《永樂大典》卷二七四一引《廣州路志》。

② 見牟巖《陵陽集》（四庫全集本）卷十五〈跋崔清獻公帖〉。

③ 見《平齋集》卷十三〈通崔菊坡書〉。

司敦遣到臨安，以布衣出任史館校勘<sup>②</sup>。再如程公許有文才武略，與之乃辟置於幕府，稍後又推薦他調任崇寧縣知縣。公許也深深地感念與之「握吐接士則姬公旦，夙夜匪懈則仲山甫。諸葛亮之公道，范孟博之清德，羊叔子之方略，凡異時想像於簡冊者，幸薰而炙之。」於是圖報之心，油然而生。但又感嘆當世之病：「論人才則軟熟者容，鯁直者斥，天下大勢，危若綴旒，而士大夫恬不知畏。」又不禁渴想安得公勤爲國如與之者十數輩擔當國家重任，豈不是必能置國家於磐石之安嗎？嘉定十七年（一二二四）二月，與之被召除權禮部尚書，公許感念知遇，聞而欣然，特撰文奉達以表崇仰之思。其贈序云：

國家南渡，今茲百年，中原瓜分，敵亡無日。銀夏諸部不可以爲援，山東新附尤難於堅凝，師老力殫，隱憂輟輟，此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況中外寒心於國本，而儲極未正，尚不能無疑於憂國者之懷。論人才則軟熟者容，鯁直者斥，天下大勢危若綴旒，而士大夫恬不知畏。……公之未專事任於全蜀也，將佐之能否無所辨，卒伍之功罪無所別，戶籍檢括，鹽酒規贏，營田屯田，騷然椎剝，威假於狐鼠，冠竊於沐猴。公之開府也，髮衝而苗蔣之事聞於朝，久乃不決，夫去數汚吏難若拔山，於公心寧不拂鬱於此，使公而入贊樞軸，吾知其決不能模稜兩端容容以取厚福也審矣<sup>③</sup>

與之對於此新的召命並不願往就，即連上四次奏狀，請求奉祠歸故里，以便休養病軀。史彌遠知之，乃以其親黨鄭損出任四川制置使以爲代。這年閏八月，寧宗崩，理宗即位，史彌遠更以擁戴之功，繼續獨相，專權益甚，竟公然收受閭臣賂遺，並引用薛極，胡榘，聶子述，趙汝述爲腹心，時稱「四木」，專門打擊異己。惟理宗念其有大功於己不已，還重用了其姪史嵩之<sup>④</sup>

理宗雖號稱崇奉理學，欲復古帝王之治，但細察其行事，略窺其本心，

② 《言行錄》云：「公身落翰而心王室，務薦賢以報國，在蜀擢拔尤多。」前後舉薦二十六人，各以道德文學功名表表於世。

③ 見程公許《滄洲塵缶編》（四庫全書本）卷十三〈送制置閣學侍郎崔公赴召序〉。

④ 參見不著撰人《宋季三朝政要》（宸翰樓叢書本）卷一，紹定六年記事。

卻是公私義利不分明的。南宋後期政局紊亂，政風敗壞，實始自史彌遠，理宗卻褒寵他為「公忠翊運定策元勳」之臣，且不許言官或儒臣直論其罪過。當端平元年理宗親政後，在繼任宰相鄭清之的主持下，收召十數位有聲望的賢人君子回朝，除與之外，尚有真德秀、魏了翁、李璫、游似、杜範、洪咨夔、劉宰等，但與之和劉宰並沒有應召，蓋知國家之大勢已不可爲了。這時候金朝雖已滅亡，而宋朝出師北伐收復洛陽之戰爭卻遭到敗創，大喪元氣，與之認為擅啓邊釁，將爲國家帶來不幸。曾爲此頓足浩嘆，但已是來不及挽回了。然此役實由史彌遠之姪嵩之的倡議，而鄭清之力主之，仍擺脫不了彌遠的陰影，理宗則全無英斷之能。甚至在端平二年二月，王邁任秘書省正字，於輪對時，就對史彌遠專權大加批評，理宗卻宣諭說：暫且不要談衛王（史彌遠）之事。王邁立即直言反駁說：「陛下一則曰衛王，二則曰衛王，何容保之至耶？」理宗怒而不答，即起身入內，還說：「這個狂生」，顯然而有些不耐。<sup>⑥</sup> 這些都是私心作祟而又直接反應的。劉克莊也曾直言極諫：「陛下因私天位，遂德柄臣，因德柄臣，遂失君道，非公也。因私天位，遂疎同氣，因疎同氣，遂失家道，非公也。」<sup>⑦</sup> 既然出發點就已不公正，則爲天下所擇的宰相也含有報私恩的隱情。在彌遠死後的七年間，所委任之大臣，仍不脫史彌遠色采。史臣黃震有載：

理宗初即位，仍委舊輔史彌遠，淵默十年無爲。彌遠薨，端平元年甲午始親政，相鄭清之，收召一時知名士布之朝，號稱更化。……清之開邊誤國，中外反益大耗。明年，遂相喬行簡。又明年，因宗祀大雷電，上乃逐清之獨相行簡。行簡得政，分邊防委李鳴復，分財用委余天錫，人猶惑焉！嘉熙三年，行簡請老，優以平章重事，而相李宗勉。宗勉清儉有時名，中外方賀得人，未幾，不幸以疾薨。越明年，歲在庚子，召都督史嵩之入相，嵩之尚權術，用濮斗南、劉晉之，而尤忌杜範之賢。<sup>⑧</sup>

⑥ 見周密《齊東野語》（宋元人說部叢書本）卷四〈潘庭堅王實之〉條。

⑦ 見《後村大全集》卷一九四〈劉公行狀〉。

⑧ 見黃震《古今紀要逸編》（四明叢書本）葉一。

史彌遠、鄭清之和史嵩之等人，無不忌賢害能，排斥異己，尤其專門打壓上疏替濟王申冤的朝士，端平初元，號稱起用名賢，誇示聖德，然方正有守的士大夫則不肯造朝，而負清流重望的真德秀則應詔來臨安，由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，不僅毫無任何建樹，且對鄭清之的貪妄曲爲原宥，次年便病逝了，有識之士大多爲他惋惜。黃震論之說：

……及是歸朝，方將大用之。適鄭清之非才挑繫，兵民死者數十萬，中外大耗，尤世道升降理亂之機，而德秀則既衰矣！杜範是時方力攻清之誤國，且謂其貪黷甚於前，而德秀乃奏言：此皆前此權臣玩愒之罪，非今日措置之失。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，一藥之誤，代庸醫受責。吁！果和扁也，安有爲庸醫受責者哉？其議論與範嚴恕不同乃如此！<sup>②</sup>

真德秀是被鄭清之籠絡住了，自隳清譽，遠不如杜範、洪咨夔、王遂之骨鯁，能正色直言，雖得罪權相，亦不足顧惜。相較崔與之的清風高節，德秀更是有愧色了。

崔與之往年守淮東，繼之制置四川，皆有功績，而權臣史彌遠卻任命懦夫接替，以致敗事。與之深切的了解，所以自四川被召東歸，就懇辭禮部侍郎之命，回廣州養老。其後又辭湖南帥及江西帥，端平二年拜參知政事、再拜右丞相，皆始終辭免，前後共上十三疏，這是不得已的。黃震曾評論說：

公之不作相，天下至今高之，公豈以不作相爲高者哉？天下安危繫於邊閭，或乃視爲貨賂交私之地，公帥淮、帥蜀嘗獨盡心焉，而不得行，天下事已可知矣。及金滅黠興，正國家當憂危之日，反挑強敵以開厲階，天下事又可知矣！尚何相爲？故傑然之材，惻然之心，超然之見，近世惟公一人而已！公豈得已而辭者哉？然則天下素所望其爲相者真德秀，言論丰采，文行聲績獨重，嘉定寶紹間，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。端平親政，趣召至朝，正當時道升降安危之機，略無一語及

② 見黃震《戊辰修史傳》（四明叢書本）〈真德秀傳〉。

之，乃阿時相鄭清之，飾其輕舉敗事，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。……<sup>④</sup>

這說明了理宗以後，政局日壞，無法救正，鄭清之繼史彌遠爲相，不致力於吏治的改良，軍備的充實，財計的整頓，卻妄想建立邊功以固權位，試想端平入洛之役，與韓侂胄的開禧北伐有何不同呢？韓有罪當誅，而鄭獨無罪嗎？國事至此，賢人君子是無法有任何作爲的，又何必出任宰執分擔他人的罪責呢？但是爲人臣者止於忠，崔與之忠君愛國之心是強烈的，所上懇辭十三疏，披肝瀝膽，洋洋數千言，拳拳以「用人、聽言爲立國之本」進諫。元人李習撰〈跋崔清獻公劄十三疏後〉云：

端平以來，二年之間，七劄諄諭，俾登端揆，是時年已近八秩矣！故雖老且病，猶且十三疏上，衷誠懇切，人所不能言，真可與出師，陳情相模擬，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，非所謂忠臣者能如是乎？既良且忠，爲臣之誼政在乎此矣！能保道丘，令終片庸下，良有以夫！<sup>⑤</sup>

理宗對與之下了七道御劄，遣使迎請，嚮用之意，極爲真切，與之自是感激，然年邁體衰，難任繁鉅，若是貪慕高官，反適足以誤國，是與之愛國忠君之心乃是在此而不是在被了<sup>⑥</sup>。

## 四、結 論

前述崔與之的生平，確是一位有爲有守的士大夫。南宋後期，朝綱不振，政風貪瀆，已失去了立國精神。度宗時，黃震修寧宗、理宗兩朝實錄，曾上言：「當時（寧、理宗時）之大弊有四，曰民窮，曰兵弱，曰財匱，曰士大夫無恥。」<sup>⑦</sup>實是一針見血之論，當寧、理之際，凡任制閫者都收受屬郡守貳的厚禮，習以爲常，其貪瀆之行，令人浩嘆。然與之制置四川，在離

<sup>④</sup> 見《古今紀要逸編》葉十二至十三。

<sup>⑤</sup> 見《崔清獻公全錄》卷九。

<sup>⑥</sup> 《崔清獻公全錄》卷一載元黎貞序，謂與之不顧貪祿固寵，隨俗浮沉，正得進退存亡之義。

<sup>⑦</sup> 見《宋史》卷四三八〈黃震傳〉。



任的時候則是絲毫不取，實在難能可貴。所以真德秀和皮龍榮都異口同聲的稱揚與之的廉操，上疏朝廷，力言應加甄錄升遷，以獎廉隅，奈何理宗私心太重，怕正人君子入朝直言濟王之冤，而真正為維持綱常扶正人倫之賢臣，也不願一出，以表其內心深微處的不以為然，這就是與之所以一再辭官的原因了。不過與之的同年好友程秘則極讚與之深明進退之義，立身之節，有云：「今日之來即他日之往，今日之美即他日之惡，無來即無往，無美即無惡。正子自蜀歸，屢召不至，豈其一去來、齊美惡，至是而為天遊邪？其視出於機、入於機，死生醉夢終不之覺者，又天壤矣！」<sup>④</sup> 其人格當然高出貪戀權位之徒之上。而明儒宋端儀便直指與之沒齒不輕拜理宗的任何除拜，如對除參政、拜右丞相，前後辭免凡十三疏，其內心實在是不願與敗壞人倫綱紀者共成大業的。至於毅然出而獨任平廣州兵變之事，乃是不忍見鄉里百姓飽受荼毒，及平安後，即力辭廣東經略安撫使之任，其內心所堅持的理是很嚴正的，在那個時代裡，無疑是太難得了！其言云：

奈之何黜后權臣相倚為奸，利于茲廢而理宗立，旋又擠竑於死地，三綱淪，人紀壞，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脈者，至是蓋已斷喪無遺，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，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！思欲完其名伸其道，以求無忤於心，而扶植倫紀者，南康李公燾，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，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，其意固有所主。……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，及寶慶後，帥湖南不起，帥江西不起，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。值摧鋒軍士作亂，薄廣城，公登陴撫諭，朝廷聞之，即家除帥。公既平賊，遂謝闕寄，徒以不忍鄉郡荼毒，罷勉一出，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。已而參除降麻，前後辭免至二十疏，雖祠錄永錫亦不受，此公微意之所寓也。<sup>⑤</sup>

宋端儀生當崔與之逝世二百多年之後，而能洞悉前賢之心跡，並表而出之，亦足以正人心扶綱常於衰季之世了！最後謹錄文天祥的讚嘆語作總結：

④ 見程秘《洛水集》（四庫全書本）卷九〈書崔尚書尺牘後〉。

⑤ 見《崔清獻公全集》卷一宋端儀序。

菊坡翁盛德清風，跨映一代。歸身海濱，當相不拜，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<sup>⑥</sup>

文天祥看到崔與之三十年前談國政議邊防的兩件書帖，赫然發現竟與三十年來歷史之發展相吻合，不能不讚佩與之的先見。可見南宋不是沒有人才，只是庸主不辨忠奸，權臣誤國，敗壞綱紀，絕對不會起用一些直臣，而真正的人才也決不可能仰承風旨，道既不同，又何必共事相謀呢？忠臣義士也只有「考引昔今，爲之永嘆」了！

---

<sup>⑥</sup> 見文天祥文山全集（四部叢刊本）卷十（跋崔丞相二帖）。